

发展经济学在中国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国际研讨会综述

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正处于迈向高收入阶段的关键时期。行百里者半九十。为了回顾和总结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发展经验，探讨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和促进发展的关键领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库建设协调办公室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和上海大学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论坛“发展经济学在中国：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于2018年9月7日至9月8日在上海举行。来自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牛津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劳工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奥地利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等机构的30余位中外著名专家学者发表了演讲，来自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者和来自智库、政策制定部门、国际组织、新闻媒体、学术期刊的代表共300多人参加了研讨。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发展历程，见证了一个经济体从低收入国家迅速成长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也极大地丰富了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内容、理论与方法。伴随着四十年来的发展，中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贫，并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伴随着四十年来的发展，中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见证了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成功地从二元经济社会实现了刘易斯转折；伴随着四十年来的发展，中国渐进式的改革成功实现了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对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发展经验的总结与回顾不仅对延续中国奇迹至关重要，也将为众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新的道路选择。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学部主席团主席、学部委员谢伏瞻就如何看待中国过去四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和当前经济发展形势，以及如何认识中国经验对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意义发表了主旨演讲。谢伏瞻认为，中国四十年沧桑巨变的动力与获利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第一，实现了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第二，实现了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第三，实现了各类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第四，实现了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第五，实现了从经济增长到全面发展；第六，实践新发展理念，引领新时期的发展。谢伏瞻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

四十年，是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四十年，是人民幸福感、安全感、民族自豪感显著增强的四十年，是不断探索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四十年。中国经济四十年年的发展，借鉴了发展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更重要的是紧密联系了中国实际，推动了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总结起来，中国的发展是建立在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上，是在实行了近30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通过渐进式改革在一个世界人口规模最大、城乡高度分割、城乡差距较大的大国实现的，中国在不同时期调动和发挥各地区优势，充分挖掘了区域经济潜力，充分利用了大国经济的回旋余地。

一 经济增长的奇迹

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2017年，中国取得了年均9.5%的高速经济增长，在人类历史上不曾有任何国家、任何地区实现过持续这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从1978年至今，中国人感受到的生活水平的改善也超过了20倍，超过了所有的历史记录。这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怎样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既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内容，也是延续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为众多发展中国家提供道路选择的经验总结。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认为，由于各个国家发展的起始条件不同以及资源禀赋和相对比较优势的差异，发达国家的主流经济理论解释不了中国的发展奇迹，也指导不了中国的发展实践。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即现有产业技术不断提升，以及新的、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不断涌现。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发展过程本质上是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就是根据比较优势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通过改革开放践行“双轨制”（即老人老办法，维持稳定；新人新办法，使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快速变成竞争优势），从而积累了资本，使经济逐渐从资本相对短缺变成资本相对丰富。因此，新结构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就是利用比较优势形成竞争优势，积累资本，促使产业不断完善升级。

劳动力毫无疑问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要害。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蔡昉从如何把人口红利转变成经济增长动力阐释了中国过去高速增长的原因，即中国通过把农业中大量剩余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农业和农村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非农和城市部门转移，把人口就业压力转化成了人口红利，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提高带来了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同时劳动力丰富意味着产出多而消费人口少，可以把经济增长剩余储蓄起来作为可投资的资本，这样资本报酬递减不会发

生。但高速增长 30 多年后，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负增长、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上涨，导致资本回报率开始加速下降。要稳定并提高潜在增长率只能依靠改革红利，主要的改革领域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改善人力资本积累体系的教育和培训改革、调整人口政策、财政系统的改革以及金融和银行领域的改革等。

经历近 40 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原有的经济增长源泉已经枯竭，未来经济增长面临何种挑战是必须面对的重要理论问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邵若素（Ross Garnaut）认为，中国经济改革与增长 40 年后面临的挑战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宏观经济的挑战。中国的整体增长模式需要从出口依赖型向内需依赖型转换。第二，结构性调整的挑战。中国经济需要通过创新和技术进步进行产业升级。第三，环境挑战。无论是从中国自身发展还是从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角度出发，中国都必须改变对能源的过度依赖。第四，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国作为最大的制造业产品出口国，贸易和开放政策与国际政治经济密切相关。

四十年中国经济取得令人瞩目的成长和发展，转型是其中一个典型化的特征。世界银行中国、蒙古和韩国局局长郝福满（Bert Hofman）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奇迹是来自于迅速的结构转型，中国制度的转型又是“双轨制”，即定价的双轨制。这在实践上是很不寻常的，也是有别于西方经济学家所主张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设立经济特区及其制度化的改革也是中国转型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使中国能够在全全球经济中脱颖而出。

二 改革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改革的道路既遵循了发展经济学一般意义上的规律，又有更多中国实践和探索的经验教训。通过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正视问题，中国的发展将为众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新的道路选择。

无论从何种角度观察和总结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道路，市场化都是一个关键的改革要素。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总结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从理论上讲，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有两种。第一，如何克服转型和改革中的阻力。这是改革中的政治经济因素，是非帕累托改进。第二，如何克服既得利益的阻力，如何让新的制度自然增长，以及如何克服不协调成本避免改革中出现的振荡。中国的改革一直是综合计划，即每一个部分都推进改革，而且能够容忍部分的进步。整体上，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一种过渡的渐进性的改变。

农业是中国改革和发展道路上的重要一环。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教授黄季焜总结

了中国的农业改革道路。四十年农业改革与发展的经验主要集中为四点：第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代表的制度创新是农业增长的重要驱动力；第二，技术创新是促进中国农业增长的重要驱动力；第三，农业内部的市场改革也是渐进式改革；第四，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对农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农业面临的挑战有以下几点：第一，农民收入增长；第二，粮食安全问题；第三，可持续发展问题，农业的高速增长也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未来解决中国农业发展问题还需要依靠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市场改革和对农业的持续投入。

改革开放始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业经营制度改革，改变了农业生产和劳动的激励机制，使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和农村转移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从而拉开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序幕。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钟甫宁提出，资源禀赋决定了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于主要的发达国家。受家庭经营规模的限制，中国的农业生产经营面临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的问题，大田作物的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超过35%。

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概述起来是通过制度改革使得农业中劳动力剩余状况的显性化，劳动力退出低生产率的农业，转向生产效率高的非农产业和城市部门，通过扩大开放承接了国际产业转移，引进和采用新技术，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宋立刚（Ligang Song）认为，企业对单位劳动成本上升做出的反应是用机器或者资本深化替代劳动，这与传统的雁阵模式理论有很大不同。当前，技术革命与实际产业正在深度融合。与传统的比较优势变化过程给生产和贸易带来的影响不同，技术进步对产业、市场、商业运行模式和整体经济都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面临这种挑战，中国不仅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而且需要营造弘扬企业家精神的制度环境，才能抓住新经济、高科技的发展机遇。

三 要素市场发育

回顾四十年来的发展，中国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是要素配置从计划到市场决定的过程，要素市场不断发育是中国市场经济从建立到逐步走向成熟的集中体现。其中，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发育既是体现比较优势、反映要素相对价格变化的关键，也是体现中国改革开放理论和实践创新的两个要素市场。

过去四十年，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可以归结为：劳动力配置的市场机制逐步引入到城市的就业决定中，从而促进了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促进了部门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劳动力的再配置，提高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

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都阳认为，劳动力市场发育是劳动力再配置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之一。当前劳动力市场面临的主要挑战有：第一，劳动力供给减少、劳动力成本上涨；第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越来越面对不确定性；第三，寻求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平衡点，即在灵活性和稳定性之间寻求平衡。应对策略有：第一，通过彻底的户籍制度改革扩大劳动力市场规模并优化经济结构，同时提高 TFP；第二，改善人力资本积累体系，从而满足适应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转变的技能需求；第三，用更加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来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

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对技术进步和需求变化作出反应的工作转换。国际劳工组织中国和蒙古局局长柯凯琳（Claire Courteille-Mulder）阐述了新技术发展影响全球工作的数量和质量及劳动力市场运行。未来劳动力市场的一个趋势是非标准就业方式的出现。受科技进步的影响，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化风险正在加剧。由此，就业的安全性、社会福利、工会和劳工组织等都不能覆盖这些工作岗位。如何更好地保护劳动者，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弗里曼（Richard Freeman）认为，中国可以加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作用，通过集体谈判做更多切实有效的事情。

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是劳动力市场发育的一个重要特征。亚洲开发银行经济研究和区域合作局高级经济顾问庄巨忠（Juzhong Zhuang）认为，历史上四次工业革命对就业的影响可总结为四点：第一，新的技术通常只是影响一个职业、部分工作而不是全部的工作；第二，技术可行性并不能保证经济可行性；第三，收入和需求增长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弥补这些被新技术取代的就业机会；第四，新技术会创造新的职业，甚至新的行业。

四十年的发展，中国金融最大的贡献是破解了储蓄困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认为，中国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长期并存，既是劳动力得以持续转移的前提条件，也是中国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构成这种发展模式得以维持的基础。中国的金融变革是从 1994 年开始的。1994 年之前中国的储蓄不支持投资，1994 年之后开始出现储蓄大于投资的状况。这一变化是资本市场发展的结果，也就是解除金融抑制的改革进程，包括资本市场的利率解放和各种类型金融机构不断出现。

与资本市场变化相伴随的是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从金融视角阐释了中国的对外开放、出口导向创汇型经济与双顺差关系，即资本项目顺差加上经常项目顺差等于外汇储备增加。而改革开放四十年后，要改变 1.8 万亿美元海外净资产的负收益状况，关键是改变绝大部分海外资产是外汇储备的资产结构。为此，中国的汇率制度改革不可或缺。要加速开放金融业，正视和解决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关系和优先序。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资本市场不断发育的同时，金融风险也不容忽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黄益平认为，中国金融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低成本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庞大制造业现在缺乏竞争力；第二，政府兜底政策导致货币供应量加速；第三，金融创新导致的风险，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缺乏监管。

四 工业化、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从 1978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156 美元，到 2017 年 8640 美元，变成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经济体，且没有出现拉美现象，避免了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得益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并进，使得数以亿计的流动人口获得了就业。而中国从当前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经济体，依然面临可持续发展的挑战。

工业化既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又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模式差异的体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黄群慧认为，对工业化水平的判断也是对四十年中国发展水平的判断和准确认识。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后期，离全面实现工业化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四十年快速长期推进的工业化，突出的问题是产业结构失衡和低端产能过剩，且区域工业化水平差异极大。应对战略是不能过早地去工业化、加快提升制造业的效率、促进制造业本身的转型升级。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步推进将是中国引领 21 世纪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对中国城市化状况的认识是发挥其动能的基础。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万广华提出，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率从 10% 左右的起点到 50% 需要的时间是理解城市化状况的理论基础。中国的城市化速度比拉丁美洲、欧洲、北美的国家都快很多。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经验说明，城市化是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的长期出路。同时，城市化也是解决收入不均等的途径。

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令人瞩目成就之后面临的挑战，也是全球面临的议题。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克斯（Jeffrey Sachs）认为，第一，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三大环境危机：人类经济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不可持续的土地利用导致生物多样性的缺失；土壤、海洋、水和空气等环境污染。第二，中国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可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即消除贫困、减少不平等、解决气候变化、土地使用以及环境污染问题。第三，中国的发展道路可以为全球经济做出更多贡献。比如，中国与全球能源的互联互通、低碳技术的应用；中国使用全球供应链配置食品供应，与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国家等开展合作；中国发挥“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性作用，充分推广可持续的高科技，而不是建造燃煤发电厂、输油管道或天然汽管道；在全球供应链管

理——全球可持续性的食物供给、智能城市、自然灾害以及疾病的监控方面，中国与美国、欧洲和其他国家持续合作，实现繁荣、公正、环境可持续性发展。

改革开放后快速工业化的发展，中国遇到了环境的红线、生态的底线和资源的上线三个约束。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潘家华提出，中国进一步的发展只能走生态文明之路。由于中国的钢铁产量占全球46%、水泥产量占全球60%、手机产量占全球55%左右，这些导致了中国的资源利用的上线。但工业化进程也带来了改变的机会，要充分利用技术创新尤其是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发挥对环境的保护作用，比如无线通信技术、电动汽车等。

五 社会发展与包容性增长

改革开放前期以刺激生产积极性和经济增长效率为目的进行政策调整，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收入不平等、消费滞后、社会发展不均衡及社会保障面临严峻挑战等问题。改革开放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社会发展与包容性增长是深化改革开放和促进发展的关键领域。

收入差距是反映经济增长公平性的重要方面，也是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李实认为，使用中国家庭收入住户调查数据，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收入定义及国际化的收入定义，2002 - 2007年中国的收入差距在城乡内部、城乡之间都在扩大；2007 - 2013年收入差距则有所下降。但是，这一结果是基于住户抽样调查数据的估计，调查样本没有包括高收入群体。如果包含高收入人群收入信息，目前的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会上升1%。

消费状况是反映社会不平等和包容性增长的另一重要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李培林认为，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非常低。中国所有的家庭资产中，房产已经占到全部家庭资产的68%。改革四十年收入差距扩大是社会发展的最大挑战，其中城乡差距是最大的解释因素，收入差距对消费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农民的消费和城市居民的消费行为差异是非常巨大的。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也会对消费产生很大影响。因此，为了扩大消费，必须保证收入稳定增长，稳定教育、医疗、住房等消费预期。

贫困人口的大规模减少，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显著成就，而且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之一，更是包容性增长的集中体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汪三贵认为，中国减贫成就的核心因素是持续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随着中国减贫速度的加快，扶贫方式也由区

域扶贫开发转向精准扶贫。以区域为对象的扶贫开发最大作用是推动了扶贫地区发展，缩小了区域差距。由于当前经济增长减速，彻底消除贫困需要解决激励问题及成本和效率问题。

社会保障是调节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包容的有效途径。奥地利科学院院士霍尔茨曼（Robert Holzmann）认为，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要特别关注劳动力市场变化对中国养老金保险体系的挑战。劳动力市场必须要给年轻人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并关注如何激励雇主为老年人提供就业机会，通过提高劳动参与等方式增加养老金的支付。不仅中国，拉丁美洲、东南亚等地区劳动参与以及退休年龄对于养老金制度的制定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六 融入全球化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包含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两个密不可分的部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离不开经济全球化。中国既充分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机遇，又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为世界做出了贡献。

全球化在带来分工和发展机会的同时，也产生了收益分布不公平。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韦德（Robert Wade）认为，应该对全球化进行反思，因为全球化的收益并不是在所有国家中公平分配的。除了国家之间的不公平，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全球化带来的收入增长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分布也是不公平的。中国政府在引导国内经济以及中国经济在全球化整合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经济全球化离不开创新推动，一个国家的创新体系应深深植根于全球创新体系之中。牛津大学教授傅晓岚（Xiaolan Fu）认为，中国的科研创新能力必须源自开放的国家创新体系。回顾中国的创新之路，中国已经有了一套开放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国创新体系的演化路径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种开放条件下的自主创新——既持续吸收全球的知识和资源，也不断累积自身的创新基础和能力，这是一个双方交互的动态过程。

以信息技术革命导致的交易成本和通讯成本下降为触动的全球化基础是全球价值链。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程大中认为，全球价值链对应的是不同收入水平和发展水平，北美地区、西欧地区和澳新地区，是全球收入水平最高的地区，也是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地区。在以全球价值链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应该怎么做？第一，价值链的位置跟一个国家高级要素的禀赋是正相关的；第二，全球化中，制度的改善特别是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结构非常重要；第三，中国要积极地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合作。

（执笔人：屈小博）